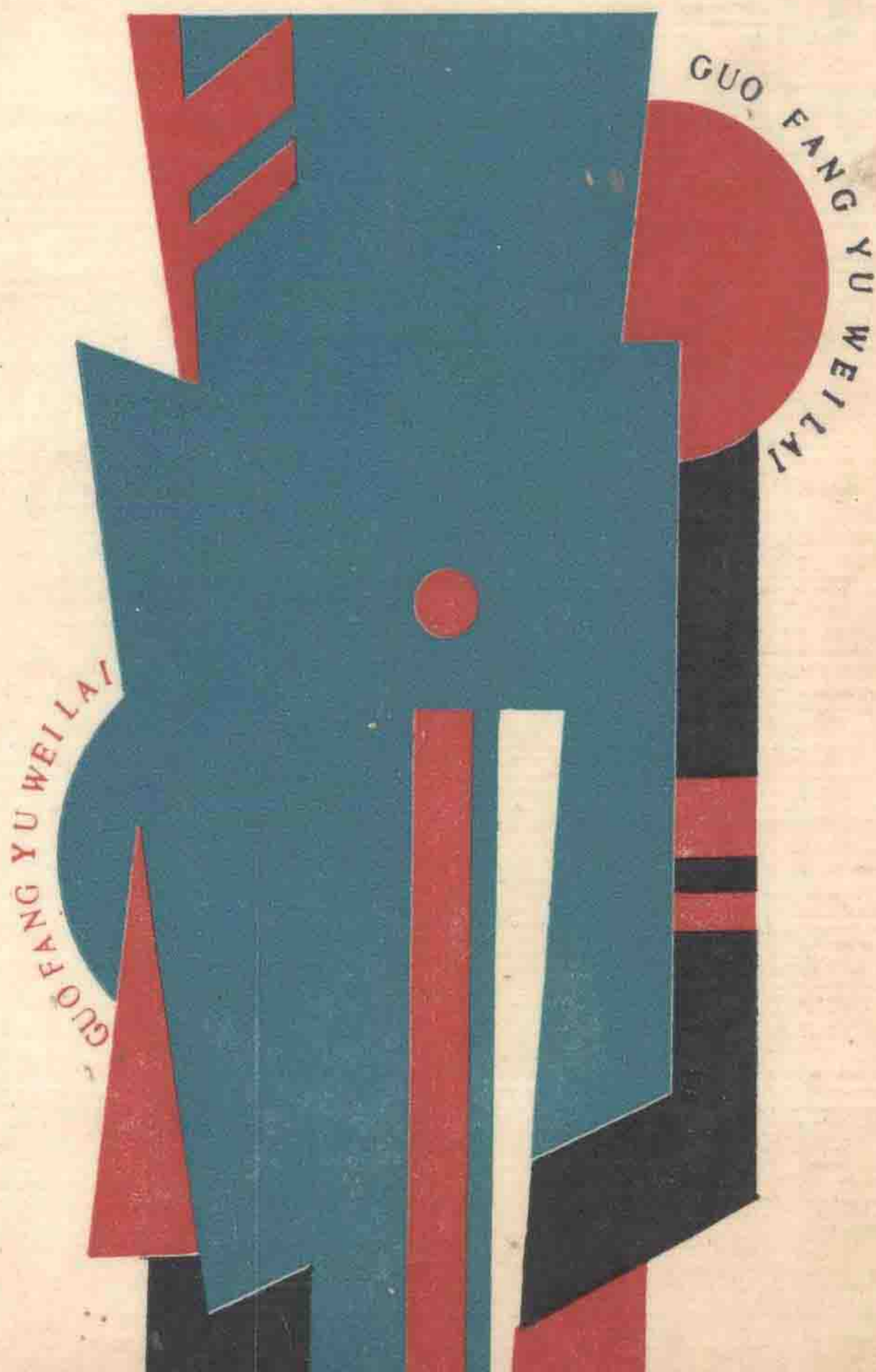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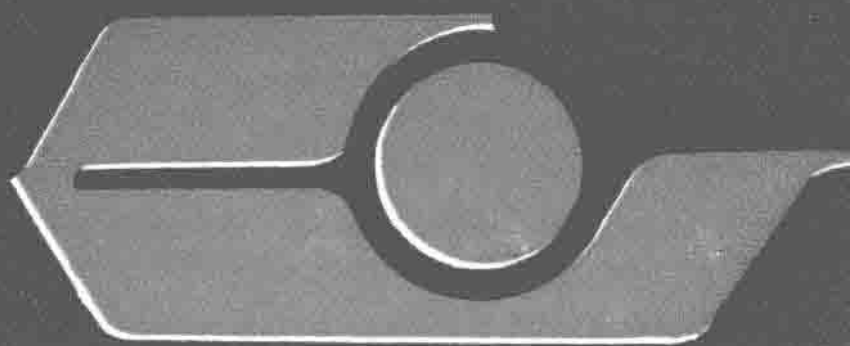


规划未来的艺术

● 华 桦 著





规划未 来的艺术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规划未来的艺术

华 桦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9.625印张 15万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5065-0357-3/E·207

定价：2.45元

《国防与未来》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吕 英

副 主 编 范传新

曾光军

编 委 王 东

朱松春

陈晓鲁

金朱德

秦朝英

章沁生

谢 钢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封面设计 林 华

编者献辞

人类跨越新世纪的“门槛”，已经是弹指间的事情了。

当我们书写本世纪的辉煌历史的时候，不会忘记那发生在上半叶的两次浩劫。战后数十年间，人类创造了从未有过的丰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时也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杀伤破坏能力，以至于仅仅现存的核武器就足以毁灭整个人类自身。

人们多么希望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的世纪。然而，美好的愿望终究不能根除那些给世界带来灾难的“基因”。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可以造福于人类，另一方面也可能被恶魔用来更残酷、更巧妙地屠杀生灵。和平？战争？不管有多少人选择前者，后者的威胁恐怕在下个世纪是很难消失的，只不过会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魔力改变其形态。

国家安危，在我们致力于加速经济建设的今天和未来，都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正是在这种思考与探索之中，经过众多的关心国防事业的同

志共同努力，萌生了这套《国防与未来》丛书。

它面对现实，更放眼未来二三十年间世界局势的变迁和战争的演变。

它着重反映从战略层次对现代军事和现代国防进行理论探讨的学术成果。

它倡导开拓精神，务求奉献给读者的是具有新论点、新观念的著作。

它追求的不只是传播知识，更渴望引起读者思索，能在读者心中撞击出创新的火花。

它之所论，纯属作者个人见解，文责自负，欢迎读者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进行争鸣，以期造成一个充满民主和谐气氛的学术环境。

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曾经说：“真理是自身的尺度。它的教导是——要追求真理，要信赖真理，这是人性中的最高品德。”当丛书的作者们在进行艰辛的研究和写作时，当严肃的读者们在捧书思索时，不就是在“追求真理”、“信赖真理”么？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事业，多么需要这种“最高品德”啊！

让我们沿着探索真理的道路走向新世纪！

《国防与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北京

写在前面的话

凡是经历了十年浑沌和这几年上下求索的人，无不为充满活力与智慧的“战略热”而感到由衷地欣喜。正确的战略选择，使一些地区的经济形势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也在改变着军队建设的面貌。众多长于宏观谋划的人才，伴随着战略研究的热潮而迅速成长起来。就连某些外国的学者也都承认：“新的一代中国人正在继承着前辈们的战略素质。”

尽管人们愈来愈看重战略研究的价值，但许多人对这一研究还不能做出明晰而科学的阐释，尤其对战略决策过程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少的困惑。

在今天，单纯描绘战略对国家和军队建设的巨大推进是索然无味的。应当将我们的视野再向前拓展一步，抖落掉那些蒙在战略决策过程上的层层面纱。就象理论工作者不满足于津津乐道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五大阶段，而是注重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怎样通过对商品的分析最终确立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一样，去探索决策与方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我们不是总在强调方法的重要吗？

活跃在今天战略研究领域的人，无论他们是老年人，是中年人，还是青年人，都是从草率决策而形成的大忧大患、大灾大难中走出来的。他们受到一种使命感、责任感的驱使，通过对人类漫长、曲折的历史的反思，形成了战略学研究的大潮，其中自然包括了对战略决策过程的探索。

人类社会经过了几千年的进化，已经走到了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时代。在这个八方杂处的时代里进行战略决策，其复杂程度和困难程度，显然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如果说，在参变量相对较少、耦合关系相对简单的过去，人们可以凭借不多的信息，通过主观的逻辑、辩证思维得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那么，要在今天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就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的系统和科学的程序。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再象前人那样“感悟”生活了。因为变化的加速度是寓于非永恒性之中的，它渗透并感染我们的意识，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行为。而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洞悉的。

战略制定过程是公众极感兴趣的题目。其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而是因为战略的运用之妙，提供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猜测领域。有关战略决策制定过程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时，这

个问题仍然是一个迷人的题目，至少是因为它体现了人类意志和智慧的最高努力。这种努力是为了主宰竞争所唤起的奔腾咆哮的力量洪流。

然而，我之所以选择了“规划未来的艺术”这个题目，并不仅仅是“神秘面纱”之下的强大诱惑，而是想为大家提供一面镜子，一面初照来可能会使人感到难堪，但终将由此而获得重大的军事、政治、经济效益的镜子。或者说，为众多的同仁提供一个研究的起点。

读完这本小书，会发现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美国官方资料，而对属于世界另一极的苏联的情况却很少提及。这并非因为“美国的月亮就比苏联的月亮圆一些”，而是苏联的战略决策过程实在是过于神秘了。

另一个需要向读者说明的问题是，当我选择了“规划未来的艺术”这个题目之后，首先跃入大脑的研究方法，就是系统、全面、详细地分析几个近代重大战略决策的产生过程。但是，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发现原来的想法过于幼稚和单纯了。我认为，只对个别事例进行研究的主要缺点是，虽然这种方法可能把某一个战略决策的具体产生过程说清楚，却不能把其他的战略决策过程作一个概括。因为，适用于某个事例的决策过程和决策组织，是

否对一组事例或一切事例都适用，实在是没有把握的。况且，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从历史中抽取于今日尚有指导意义的东西，而是立足于将历史的研究和今天的直觉互补并协。这样，就不一定非要把全部研究与写作完全奠基于历史的事实。

作者

导 言

1967年3月，加拿大东部有个儿童死于老病。

按照出生年月计算，死者雷基·加兰特只有11岁，但他患有一种叫做老年病的奇症，出现了许多只有90岁老人才会出现的症状，诸如衰老秃顶、血管硬化、皮肤松弛等等。从生理学的角度看，雷基·加兰特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压缩在他匆匆11年岁月中的是漫长的一代生理变化。

这是阿尔温·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向我们提供的一个事实。

当然，这种老年病的发生是极为罕见的，至少在我个人的经历中还不曾遇到。但是，从比喻的意义上说，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程度不同地染上了“老年病”的某些症状。他们虽无龙钟之态，却无不感到有一种超出正常范畴的变化速度而带来的苦恼。

这种苦恼，似乎更加深重地困扰着居于社会体系这种金字塔结构的顶峰，或者最高几层位置上的

决策人物，以及他们身边的智囊人员。时至今日，几乎每开一会，都免不了要发表一通关于“变化的挑战”之类的议论，免不了有些惶惶然，生怕变化已失去控制。

在这个集团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们需要更好的信息、更好的技术和更好的方法来对付各种各样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与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这似乎成了一个组织或者说是一个系统谋取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在这个集团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最令人困惑的是如何去预见未来的问题和机会，以及怎样制订出正确的战略来对付这些问题，同时充分利用这些机会。

这就是我所要讲的战略规划。

战略规划是战略决策的前提。但是，在战略决策已成为流行语汇的今天，战略规划却还鲜为人知，这不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么？

所谓战略规划，是涉及各种重要的、高层次的组织抉择。承认这样一个定义，就自然而然地导出下述问题：“一个人如何才能识别与战略规划有关的那些关键抉择的态势？”回答这样的问题看起来很简单，因为战略规划工作适用于任何一种态势。只要是与系统的总目标直接相关，同时又是面向未

来的，都可以认为是战略规划工作，至少它带有战略规划的色彩。当然，战略规划工作还要包括种种影响系统存在、发展的不可控制的环境力量。

我们许多人在从事战略规划时，常常会感到困惑、沮丧、茫然、不知所措。这种现象可以用“缺乏一个完成战略规划所必须的科学程序和完整系统”来解释。这种原因破坏了我们的决策准备，使人对现实、未来产生误解，因而无法对付未来的各种问题和利用未来的各种机会。

这种“规划病”是在任何一种医学词典中所找不到的，但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或是明智的步骤来医治这种“规划病”，我们就会感到整个组织或者系统越来越滑向无序的深渊，因而也就越来越无法理解周围的种种变化。当代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毛病，比如英国率先设计建设的计算机公用数据网络系统，只因未采用国际标准而无法在国际上开通业务；比如我们在不具备软件、计算机人才的条件下盲目购进硬件，以至广州、北京、深圳积压几十万台微型计算机；比如我军后勤装备与作战装备未能同步发展，在其现代化程度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造成“木桶各块木板长度极其悬殊”等等，现在还不过是一些朕兆。它告诉我们，忽视战略规划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危险。目前，至少可以说，可能会使我们在现有

基础上拉大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象一些同志运用“兰切斯特平方律”所证明的那样：“当初始兵力对比有了一定的差距，而力量较弱的一方又不善于分化敌人的力量，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出现一种弱者愈弱，强者愈强的‘雪崩效应’。”

这决不是夸大其辞。使用“雪崩效应”这样的字眼，原是要唤起我们对于周围事物变化速度和深度的广泛注意，从而不断地进行“滚动式”的战略规划。当然，笼统地这样讲可能会引起误解，因为我们面临的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深、都广、都更加重要的变化。同时，我们尚不具备一套完整的战略规划体系和一个科学的战略规划程序。

因此，有必要详细复述前面已经提到了的战略规划的内涵。在当前万花纷呈、百流竞驰的战略领域，似乎没有偶像，没有权威。这对于克服趋附、盲从的积习，构成多元化战略思想的大潮，进行富于个性的创造性思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时机。然而，这里也潜藏着一个危机，就是缺乏学习对象，缺乏科学规范。因为在战略决策的过程里是没有“绝对自由”的，忽视规律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正因为这样，我才敢于冒昧地将自己的观点和盘托出，企求为别人提供一个研究的起点。

我认为，凡是以未来为主导、与环境相关联

和直接影响组织或系统总体目标的活动，事实上都会对组织或系统的特性、方向发生重大影响，而这种活动就属于战略规划范畴。

这样的看法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阐释。

例如，一项旨在提高经济效益或军事效益的决定，可能不属于战略规划范畴。因为降低成本与我们组织或是系统的总体目标并不直接有关。战略规划首先考虑的应当是效果，而不是效率。效果即产出与目标的紧密度，效率则是投入化为产出的比值。当然，很多属于战略规划范畴或是带有战略意义的事件，其效果是在久远的后来才显现出来。以现代的标准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只不过是一场小打小闹。但正是这场战争，改变了人类移动的方向，改变了思想、价值观念的地理分布，从而深刻地改变了后来希腊的历史进程。

从军事上讲，关于某种新装备的种种决策，诸如在某一时间上投入哪些新式装备，这通常是战略性的，而关于这种装备的战术技术指标的讨论或者是评定，对国防就没有战略意义。关于这样的问题，玛格丽特·杜鲁门所著的《哈里·杜鲁门》中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

“1945年7月，我的父亲集中注意力于三个更为复杂的，相互纠缠在一起的问题”

题：原子弹问题；入侵日本问题；与丘吉尔首相及斯大林元帅举行三巨头会议的问题。这个会议预定为7月15日召开……

父亲之所以不把会期订死，是因为他想把那个会议拖至原子弹试验之后。如果试验成功，那也许就用不着俄国对日本作战，也就用不着在欧洲对苏联再做什么让步以换取苏联人在远东提供援助的承诺。”

而在当时，原子弹的威力据官方推测是5000吨TNT当量。实际上，这仅仅是一种猜测。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一流科学家非正式地设注打赌，看谁的猜测更加接近于实际。这些专家猜测的数字，大到45000吨，小到零吨。大多数人把赌注押在很低的数字上。例如罗伯特·奥本海默打赌说，爆炸当量顶多不过300吨。

再比如，假设某一要素在我们系统内部尚未存在，或者至少是部分地不存在，那么，有关这一要素的决定就是着眼于未来的，因而也就是战略性的。那些目前尚未组建的军、兵种，或者是正在组建的军兵种，诸如我军的陆军航空兵、美军的战略报复军等等，均属于这种情况。1954年，曾担任过美7军军长的加文少将发表了一篇叫做《骑兵——但不是指乘马的骑兵》的论文。在此之后，美国陆军航校的杰

伊·范德尔上校进行的直升机部队的编组试验，以及后来的陆军航空兵主任豪兹少将所做的种种努力，在今天看来就带有战略的色彩。

不仅如此，如果说总体目标是战略规划的第一要素，着眼未来是战略规划的第二要素，那么，用以描述战略规划内涵的第三个要素，便是关于环境力量的重要分析。战略规划通常涉及那些受到各种外部环境因素的重大影响的问题。因此，在提出未来的战略目标或方向问题之前，必须首先弄清楚我们未来可能会面临的社会、经济、技术和政治因素。否则，一旦发生偶然的事件，所进行的战略决策就可能失败。

事实上，关于战略规划的内涵，人们还可以列举出许多。前述所指，只是其丰富内涵中的最基本骨架。但是，我们只要能寓丰富于单纯，抓住这“三足鼎立”的基本骨架，就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战略规划的抽象定义。就象我们抓住了“ $\frac{\quad}{\quad}$ ”这样一个算符之后，四尺孩童也会理解除法的含义。而这种智慧，在中世纪之前，欧洲人要读到大学毕业才能学会除法，而要掌握除法的奥秘，还需到意大利去留学。在那样的条件下，最大的数学天才要用毕生的精力才能完成百万数的求商计算。

这就是抽象成骨架或是浓缩成精髓的功力之所